

2401

家谱研究管窥

孙定朝
孙建朝 著
孙 昊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
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编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之四

家谱研究管窥

孙定朝
孙建朝 著
孙 昊

一九九八年十月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

主编 章德华

编委 朱崇演 李守明 张建军

李人选

“家谱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摘自 1984 年教育部、文化部、
国家档案局联合《通知》

作者简介

孙定朝，男，汉族，1942 年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 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学教育 32 年，现为贵阳市乌当二中高级教师。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学会会员、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理事、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会员。

曾撰写《从系谱资料看古代西南彝族的迁徙动向》等论文 30 多篇，在中央、省级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与人合作编写出布依族村寨史 17 万字，布依族、苗族家谱 7 万字，由省民研所、市民委刊印。与弟弟整理点校的古代彝族部落史《且兰考》，在台湾出版发行。业绩载入了《中国中学骨干教师辞典》，并获荣誉证书。

孙建朝，男，汉族，1949 年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85 年毕业于贵州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1988 年结业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学创作班。现任《贵州工人报》编辑，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会员，贵州作家协会会员等。喜爱写散文和散文诗，近几年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作品。著有散文集《感觉的多余》，散文诗集《人生二重奏》，专业论著《企业报概论》。

孙昊，女，土家族，1977 年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97 年毕业于贵州教育学院。喜爱写作，近几年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 30 多篇文章。

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

史料研究的重要领域（代序）

朱崇演

作为《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编委之一，我以极大兴趣先睹了孙定朝、孙建朝、孙昊合著的《家谱研究管窥》一书。虽然自己对谱牒学是门外汉，但还是不揣冒昧，想说一点自己的感受和不成熟的意见。

首先，对作者把目光放在家谱的搜集和研究的独到治学方向，表示积极赞同和敬佩。特别是作者刻意搜集我省少数民族家谱，并为之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累遭侵犯，历尽劫难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繁荣的文化和爱国主义传统。这些因素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在若干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的文化现象中，“根文化”起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的《百家姓》专题片，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关注。许多白发苍苍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在祖茔、祖居前留连徘徊，百年之后还要把遗体归葬故土。这种对家园依恋之情，感人肺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寻根访祖者，纷至沓来。应当说，一些外资的投入，不排除有利可图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落叶归根的涵义。因此，对“根文化”的研究，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

作者在《拥抱祖宗》一文中写道：“改革开放的洪流和世界发展的趋势，促使人们更迫切、更热烈、更认真地去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深深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热潮的感染和启发，比较关注社会的发展问题。”“我们着重从大文化的发展方面进行思考。结果选择了对少数民族谱系研究，这么一个人们看来所谓‘十分冷僻’的课题。试图证实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习俗、民族融合等方面，谱牒文化的当今价值”这个研究方向，我认为正确的。因为就贵州地区而言，过去史籍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是不完整甚至是不公正的。历代编史修志的人，除了站在统治者立场之外，对实际情况并没有作深入了解，连称谓上都要加上一个“蛮”旁，表现了明显的歧视。少数民族中的先进人物，把口述家谱变成文字家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以同情、赞美、虚心的态度去搜集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谱牒，我敢说孙定朝先生昆仲、父女是先行者，应当为他们叫好。

其次，作为谱牒学主要内容的家谱、族谱，虽然涉及的时限远远超出了近现代史范畴。但我认为仍然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今天的贵州，是昨天贵州的继续。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无产阶级文化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地继承历代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近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是时代特点……。”要尊重历史，不能数典忘祖。

无庸讳言，在现存的家谱中，都带有当时编著者的阶级烙印，含有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的特点。作者在评介一些家谱时，已经注意到这些方面。关于家谱存在的意义，作者论述道：“谱牒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都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企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获得的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祖先那里，在自己的血缘中寻找祖宗留下來的‘出路’。在自己的家庭、家族中寻找有力的支持和援助；在阶级社会里，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生活中，去寻觅一种自我解脱的能量等等。”我认为这些议论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深入研究，谱牒的存在，应当还有一些积极意义。譬如说，谱牒文化之所以能被众多群众接受，还因为它规定了一些相当于现在乡规民约的“族规”，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谱牒文化的繁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以及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家谱的编修，在一定意义上还鼓励族人奋发向上，告诫族人不要为恶的意图。前面说过，这是作为门外汉之言，姑妄听之。

由此派生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谱牒文化是否还有生存的土壤，能不能利用家谱这个“旧瓶”来装上“新酒”。本书搜集的40部家谱中，有三分之一，即13部是在1981年以后编修或重修的。据笔者了解，在一些富庶地区的农村中，续修家谱成为一种风尚。是积极引导，对传统的家谱加以改革，使之含有新的健康的内容，还是全盘否定？这有待于谱牒学者进一步加以探讨。

第三，有必要把家谱、族谱等谱牒资料，列为史料学工作者的重要内容。

历史研究者必须凭借详尽而可靠的史料，才能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通常使用的史料，一般有文字史料、口碑史料和实物史料。文字史料中，又可区分为公文档案史料和书报记载的史料。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为官方公文，后者为民间著述。家谱、族谱等属于民间著述，同样是文字史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史史料学家李永璞教授，多年来不懈努力地开发“新史源”，即把党史研究资料、文史资料和地方志资料作为新的史源，这是有远见的主张。愚见以为，如果把谱牒也加以搜集研究，则将使史料宝库更加丰富，更为完整。

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谈到近代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个历史工作者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这种强调和告诫，应当是史学工作者特别加以注意的。孙定朝先生等在坚持本职工作的同时，走乡串寨，上下求索，利用一切机会寻找谱牒，这种勤奋态度，值得学习。

老一辈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说过：“搜集史料，并不是一种容易事情，因为中国的史料，虽然浩如烟海，但他们并不像宝库里的金银聚在一起，可以应手取得；而是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耐烦去探

索。”（《史料与史学》第61页）本书作者不厌其烦的探索，相信会淘出珍贵的矿石的。显然，他们已经有所收获，结集在本书中的不少文章已有可喜的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者来进行这种探索。

第四，本书作者是兄弟、父女关系，一家人都来从事谱牒学的搜集研究，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特别是年轻一辈也来做这种冷僻、枯燥的史料研究，十分难得。作文史工作的同行们有一句行话，叫做“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搞史料，是要甘于寂寞，勤于积累的。他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合三人之力，终于结集出了这本书，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最后想说的是，在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向和勤奋态度的同时，也不能否认书中还有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个别结论尚需商榷。但是，瑕不掩瑜。假以时日，作者必将会取得更大成就。

（朱崇演，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副编审。现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目 录

试论族谱研究与方志研究的关系·····	1
家谱中字辈排行诗所表达的古人心态·····	7
从系谱资料看古代西南彝族的迁徙动向·····	20
汉、彝关系史述略·····	29
古代播川县考·····	55
濠州旧治在今涧坝考·····	57
彝族姓氏起源初探·····	60
苍坡西苗寨苗族祭祀习俗·····	65
苗族何二王起义初探·····	74
孟获是谁?·····	80
《欧阳谱》考释·····	82
贵阳花溪《班氏谱系》考释·····	91
夜郎族属新证·····	99
“金筑”的来历·····	105
一部特殊的家谱·····	107
《宦游纪略》所反映的晚清社会问题 和高廷瑶的法律思想·····	113

拥抱祖先·····	129
《夷谱》所载“永敦和好合同”·····	145
一份难得的史料·····	149
从《黎平任氏族谱》中发现的任不齐 生平材料·····	155
独山杨焯芳先生小传·····	158
龙泉县达泉书院山长聂绍中先生小传·····	163
水田小寨《高氏族谱》所载资料辑录·····	165
布依族聚居的竹林寨历史沿革·····	180
整理点校《且兰考》说明·····	191
高廷瑶的爱国护法之举·····	197
高廷瑶与北衙书房·····	201
宋斌墓志铭·····	208
石头寨奠基人刘志洪的故事·····	216
一封信·····	221
美国收藏的中国家谱·····	226
家谱与历史(译文)·····	228
贵州民间珍藏家谱提要·····	284
后记·····	

试论族谱研究与方志研究的关系

在我国,族谱源远流长,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起着不同的作用。今天,它作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方志的研究,仍将发挥作用。笔者仅就自己接触到的几部族谱与贵州地方史志的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族谱与地方史志研究

族谱与地方史志的关系,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1、族谱既是“一家之史”,它记述了某地一个姓氏的发展、变迁、兴衰的历史,也就包括了这一家族的繁衍、迁徙、分支、人口、官宦、灾异等内容。而这些正为地方史志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生动、详实的重要材料。

2、在族谱中保存有农民战争的许多宝贵资料,这是囿于政治避讳的正史所缺少的。例如,《方氏族谱》就曾为我们补充了有关方腊起义的重要材料。

3、族谱还反映了各民族的变迁,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族谱,对于研究民族史是极为宝贵的一个方面。

4、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多以私塾为主要形式,而族谱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对于地方史志中文化教育发展的研究,

教育方法的探讨,至为重要。

族谱对于地方史志的研究作用及价值还远不止这些。另如:从族谱中坟墓记载,对于发掘和研究古代墓葬有一定参考价值;从族谱中的“艺文”,对于考证地方艺文及名人学者著作亦有较大作用;从族谱中还可查找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诸如地震之类等等。

二、族谱研究与贵州地方史志研究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对黔北凤冈县、务川县、及黔东北思南县等地族谱的研究为例,具体加以说明。

(一)有关贵州地方土地开发及其他问题。

1、上述族谱提供了明、清以来贵州居民的迁徙情况。如龙泉县《欧阳谱》载:“始祖讳愈顺,系吉州刺史讳琮之苗裔。……于明朝成化年间,游学至贵州石阡府龙泉县。建宅中街青冈门居焉”^①倘能将其族谱中的同类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知道当时贵州人口流动的整体情况。

2、从某些族谱中所记宣绩,可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如龙泉县杨氏历史上即有:“传闻杨通表与田宗显、朱、安、邵、李、何、陆、王、吕十姓等,奉旨征金头和尚,由陕西追川入黔至思南府挂榜山,乃得而诛之,详申报捷。殿下念厥勋劳,封为镇国公,且世袭焉。仍留黔山各据一隘,共为保障。迨历我朝(清),犹念前绩,只削其禄,不贬其爵,所以龙泉巡检司今犹有陆姓之衙门也。”^②而聂氏,“祖云凤公,自江西瑞□□高安县,孤征来黔”。^③凤冈陆氏,“始祖行三,江西抚州府金溪县青田里人,象山祖九世嫡孙。祖奉命行征军、韩二姓,

勇敢当先，两战皆捷。敕封偏刀水（今凤冈县琊川）正长官司，镇守此境，事载黔志。世袭其职。”^④“黔南张氏始祖张恢，字王植，号新宇，系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人……宋高宗南渡中原，鼎沸黔中，分扰四夷，思州彝把苗崇范、冉万花，纠伙作乱，骚动川东。恢奉令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率其子煥，同浙东副总管李显忠，权四川宣抚司郑刚中、知思州军机事田宗翰，统领土、汉军兵，大行征剿思州三十六洞、镇远、黎平、龙泉坪等处苗蛮，克服班师。”^⑤

而务川县《谢氏族谱》则记述：“黔省边陲之郡清城，孔道之区，地瘠民贫，夷多汉少，差繁事冗，俗靡人劳。莅兹土者，来务始祖谢鼎新，授指挥校尉千户侯。永乐八年（1410年），奉旨征南来务邑……。”^⑥

此外，我们还不难发现许多有关当时贵州的风俗民情材料。

（二）关于人口的记录。

族谱中不乏关于人口的变化历史资料。如：“龙泉欧阳氏八十六年前，户将满百，子矜济济，仕宦有人。夫何方盛之际，而当明末之秋，遭王祥之乱，邑中逃散俱尽，绝烟三载，流离异地。免作野殍者，百中仅有一、二。故族中归土者，不过余之父伯叔侄弟兄十余人而已。”^⑦又记，“盖自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贼匪始出，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告静。前后十二年，二百二十六名男女，存四十八人。”^⑧

上述资料同时还说明：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社会的安定是人口增长的前提；战争、饥荒、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则是人口猛减的重要因素。

（三）对于农民战争的描述。

族谱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述比较多,既有专题记载,更散见于个人的传记之中。如,清代贵州几次重要的各族农民的起义,都在其族谱中、或他姓的族谱中有较详实的反映。

1、关于白号起义军在凤冈县及附近县的活动情况。龙泉县《杨氏族谱》载:“凌云杨翁,龙泉廩膳生也。……因叛逆滋扰,白号横行。虽有一怒,安民之志,大权未操,三年伐暴心,斧柯谁假?于是弃而违之。避乱桐邑,借宿娄里……。”^⑨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白号军势力强盛的情况。该谱又载:“盖自咸丰七年丁巳,贼匪始出。同治七年戊辰,告静。前后十二年。”^⑩这应该是白号义军活动于今凤冈县时间的可信记录。而另一个族谱记云:“……迨至咸丰七年丁巳,季□□和团之逆贼蜂起,势欲攻城,此劫之已至也。次年戊午□□□□,由高营山底城,攻之不克。城兵出,敌大败之。杀贼□□□□□。二十四日,贼党万余,又由彰坝底城,上方团结□□□□□战,将贼败溃,获贼首数十余具。扎飭熙等,严□□□。末春,贼夺纱帽山营。夏四月初旬,又夺大关、小关二隘口,□□烧掳一空,熙之家与焉。是时,熙扶老携幼,避在湄潭所属地名保洞顾友家中。五月初旬,贼攻城不克,渐次远退。熙与子光钊回家一顾,一无所有,勉强栽插,经营草舍。……十月,提台蒋在偏场与贼战不利,贼势张大,陷湄潭,烧永兴,由此复攻龙城。熙与堂弟际泰,又避于城之西北方,迁移无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城兵团练,大败贼党万余于三岔路。……壬戌,此方数十里略清。癸亥冬,安贼由纱帽山底城,烧毁乡村;朱贼由七里坝底城,烧毁城外。官兵与各团,奋勇克之,城保无虞,寨营无害。熙是时全家与族众,避于穿矸洞中。”^⑪这个关于白号义军的亲历记是无庸置疑的。此有关刘

仪顺领导的白号义军,在今凤冈县境内的活动始末材料,较《贵州咸同军事史》更为生动、详实而可信。

2、关于红号起义军的情况。龙泉《聂氏诸系》曾载:“咸丰癸丑年(1853),……湄、龙、永兴各处,是年宣讲[扶]乩,相习成风。地方官亦不禁,少长智愚,皆信从焉,而士子更甚。渐沿至勾家山、山羊溪等处。……迨乙卯(1855年)、印江、[铜]仁地方普遍。[铜]仁举人梅济鼎、徐廷杰,石阡毛大仙,印江赵子龙,同昌首为乱。有红号、白号之分。遂隐陷铜仁、松桃、思州、石阡。冬十一月十二日,思南、印江亦陷。满城男女,大小官长皆逃。不数日,幸被官兵、乡团克服。吾乡远近虽荡摇,卒仍如故。是月,梅济鼎战死城外,毛大仙死石阡,惟赵子龙收余党,扎住梵净山。丙辰年冬(1856年),方扑灭。咸丰丁巳春(1857年),楠木坪相传为梁芳先生之后,家务颇丰,被人诱惑,相习邪教一名拜灯教。怀判返逆之意,术未行而各处乡团聚集如云,官兵相继于后,一举而瓦屋废为坵墟,数十口性命,尽成灰烬。”^②

3、关于王祥领导的起义。王祥,四川綦县人,在家乡起义,旋遭失败。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率残部逃往贵州龙泉县,龙泉县的群众纷纷起来响应。这段历史即可见于龙泉县《欧阳谱·传记》:“文林郎府君讳华东,字征……戊子(1648年)兵变,避于泥水巖空山,而罹锋刃于王祥之害。长子瑋忧,趋救亦被贼害。……”举邑之人,皆溃散四方。^③

(三)经济状况

族谱中载有许多经济状况资料。如,某地的气候、农业的发展变化、谷米的价格;某地某个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等等。我们仍以今凤冈县、思南县